

禮失求諸野：中華文化如何成為西方反思的「他者」

吳志良

一九二〇年，梁啟超結束歐洲考察，寫下《歐遊心影錄》。彼時一戰硝煙初散，歐洲滿目瘡痍，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正在德語世界激起千層浪。一位美國記者嘆着氣對梁啟超說——「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我回去關起門來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輪進來救救我們。」

百年後的今天，相似的嘆息再次從大西洋彼岸傳來。不同的是，這一次不再是文人的浪漫感慨，而是制度性焦慮的集中爆發。英國脫歐暴露了區域整合的脆弱性，俄烏衝突揭開了安全秩序內傷，特朗普現象則徹底戳破了「自由國際主義」的道德面紗。聯合國安理會淪為大國角力的劇場，國際人道法在無人機轟炸面前蒼白如紙。戰後建立的那套以主權平等、集體安全、多邊協商為支柱的全球治理體系，從未像今天這樣形同虛設。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關口，西方思想界開始了一場意味深長的「回望」。他們回望的不是古希臘羅馬——那個源頭已經被挖掘殆盡；他們回望的，是十六至十八世紀那段歐洲熱情擁抱中國文明的歲月。

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漢金斯在二〇一九年的講座中，詳細復盤了利瑪竇的中國觀。他指出，利瑪竇稱讚中國政治的三個核心特徵：科舉考試、革命正義、文人治國——這不是獵奇的東方想像，而是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與儒家思想的一次深刻共振。利瑪竇深信「美德政治」的可能，並在晚明中國看到了一個不靠血統、不靠神權、不靠暴力，而通過公開競爭選拔德才之士來治理的龐大文明。

但為什麼這條「賢能政治」的線索在歐洲早早夭折，卻在中國綿延兩千年？漢金斯的回答發人深省：西方在十七世紀後，政治思考的重心從「如何選出好的統治者」轉向「如何防止壞的統治者」，憲制設計、權利保障、契約

自由成為主軸，而對「德性」的培育、對「教化」的重視，逐步被放逐到私人領域。

這正是南樂山工作的意義所在。他畢生致力於將儒家從「地域性倫理」提升為「普適性哲學」，在代表作《儀式與尊敬：比較情境中的中國哲學》中，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命題：當代文明衝突的根源之一，是缺乏能容納文化差異的「全球儀式」。

「儀式」——或者用中國古語——「禮」。南樂山以驚人的跨學科視野，將荀子「禮起於欲」的思想與皮爾士符號學、現代心理學相勾連：儀式並非壓抑欲望的桎梏，而是為欲望賦予方向、將生物人轉化為文明人的符號實踐。更重要的是，他把這套理論延伸至全球治理：聯合國安理會的議事規則、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外交場合的禮賓安排——這些都是現代世界的「禮」。其功能不是消滅衝突，而是為衝突提供可預期的表達通道；不是強求一致，而是在差異中構建最小公約數。

當國際社會陷入「禮崩樂壞」——大國可以繞過安理會單邊動武，貿易協定可以被國內政治周期隨意推翻，基本外交禮節淪為選舉秀場的表演素材——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權力格局的失衡，更是一種符號秩序的瓦解。南樂山提醒西方讀者：以為「禮」只是中國的封建糟粕，殊不知每天都在依賴它的現代變體運轉社會。而我們恰恰遺忘了對「禮」的系統性反思與重建能力。

另一位美國哲學家白彤東與施特勞斯學派的論戰，則將這一對話推向了更深的層面。施特勞斯強調哲學家的本質是「zetic」——永不停歇地懷疑與追問，永不滿足於任何既定的政治方案。白彤東則認為，先秦儒家思想家恰恰選擇了另一條路徑：他們進入權力中心，在秩序內部實踐哲學，將思想轉化為制度。這是兩

種文明的深層差異：西方哲學傳統更珍視批判性距離，中國儒家傳統更看重轉化性參與。

段德敏的《東西方之間的托克維爾》，在跨文明對話中投下了一塊新的界碑。他呈現的托克維爾既不是冷戰意識形態鬥士所塑造的「反集體主義先知」，也不是左派學者眼中的「貴族保守派」。這是一個對「民主」懷有深刻憂慮的思想者——他擔憂身份平等可能導致人心萎縮，擔憂個體原子化會消解公共精神，擔憂現代國家雖不專制卻可以無比瑣碎地奴役人。他筆下的「自由」絕非抽象的自然權利，而是一套心靈秩序、習俗建制、交往儀軌的複合體。這種對「內心秩序」與「人與人聯結感」的強調，與儒家傳統形成了驚人的親和性。

從十六世紀利瑪竇的讚嘆，到十八世紀伏爾泰的借鏡，從二十世紀韋伯的困惑，到今天漢金斯、南樂山、白彤東、段德敏的對話——四百年來，中國文明一直是西方反思自身的「他者」。這個他者有時被理想化，有時被妖魔化，卻從未被真正繞開。

今天，當西方再次站在制度與精神的十字路口，這個「他者」的意義超越了比較哲學的書齋。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提供了一份不一樣的答卷：它證明高效率的市場可以與連續性的政治秩序共存，深度參與全球化可以不以犧牲文化主體性為代價，技術躍進可以嘗試與倫理約束並行不悖。這份答卷無意自封完美，但它確實開啟了一種可能性——現代性並非只有十八

世紀歐洲規劃的那一張藍圖。

「禮失求諸野」。當軸心文明的核心區陷入精神內耗，邊緣往往成為新思想的策源地。這並不是說西方需要向東方「皈依」，正如十八世紀啟蒙哲人並非真要變成儒家信徒。他們需要的是那面鏡子——一個足夠遠又足夠清晰的他者，幫助他們辨認出自身制度的偶然性，從而重新獲得選擇的能力。

第二次啟蒙的本質不是替代，而是參照；不是歸宗，而是對話。當西方思想家意識到，儒家關於「和而不同」、「禮以時為大」、「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古老箴言，竟能為數字時代的全球治理提供鮮活靈感時，他們或許會重新理解自己傳統中那條被遺忘的支流——那條也曾流淌過美德政治、公共教化、社群紐帶的思想支流。

中國沒有「輸出文明」的使命，但有參與文明對話的責任。在這場以「第二次啟蒙」為名的全球合奏中，中國既不是指揮，也不是首席，而是一個誠懇的演奏者——攜帶著五千年積累的樂譜，剛剛調試好手中的樂器。

世界正凝神傾聽。



三月十一日，人們在美國紐約進社中國美術館參觀「飛翼歌舞：華美協奏」展覽。

與春對坐



自由談

張君燕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這是唐代詩人李白在《山中與幽人對酌》中的句子。深山為席，山花作伴，與知己相對而坐，不必多言，只把杯盞一次次舉起。此情此景，事事稱心如意，於是乎開懷暢飲，頗有「將進酒，杯莫停」的快意之至。

沒有朝堂的紛擾，沒有世俗的牽絆，只有春風拂過花枝的輕響，酒香混着花香的沉醉。由於貪杯，詩人許是酩酊大醉了，於是打發朋友先走——「我醉欲眠卿且去」。此處借用了陶淵明的典故，《宋書·陶淵明傳》記載：陶淵明不懂音樂，但是家裏收藏了一把沒有琴弦的古琴，每當喝酒的時候就撫摸古琴，對來訪者無論貴賤，有酒就擺出共飲，如果陶淵明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與陶淵明相比，李白更為恣意任性，他雖喝醉，卻還餘興未盡，不忘囑咐朋友「明朝有意抱琴來」。他將春光視作最珍貴的饋贈，與知己一起活在當下，盡情享受豪放與通透。

春日飲酒，花間尋歡，這份酣然在宋時筆墨裏亦有回響。蘇軾在《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中吟道：

「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杜甫《漫興》詩中有「狂風挽斷最長條」之句，白居易《晚春沽酒》詩中則說：「百花落如雪。」「花間置酒」化用了這兩句的詩意，花與酒互相映發，賞花與飲酒的興致愈加強烈。

杏花月下，蘇軾與友人舉杯，伸手挽住垂落的花枝，讓片片粉白落英飄進酒杯，像把整個春天都斟進了酒裏。這份鬆弛與悠閒多了幾分宋人的清雅，不迫名逐利，不憂煩過往，只對春日有無盡的貪戀。

我們卻常常在忙碌中，辜負了眼前的春光。有個尋常場景，也許你我都曾經歷過：工作日的傍晚，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家，窗外的玉蘭開得正好，我們卻被未完成的工作、瑣碎的家務絆住腳步，顧不上抬頭看一眼。好像這一切還不足以讓人停下喘息，緊接着又接到臨時的消息、未處理的瑣事，連靜坐喝一杯茶的時間都成了奢望。反觀詩人們「對酌賞花」的自在，突然明白——我們總在不經意間錯過春光，忘了真正的美好，一直都藏在「盡興當下」的片刻裏。

對熱愛生活的人而言，一抬眼，便是與春對坐的清歡。縱使瑣事纏身、步履匆匆，也別忘了提醒自己，沒有比「當下」更珍貴的時光。



繽紛華夏

王婉若

一場夜雨過後，寒意便退了大半。清晨推開窗，風裏已經沒有了冬日的刺骨，反倒帶着幾分濕潤的溫柔，輕輕撲在臉上。我站在窗前怔了片刻，忽然就想起那句「春風柳上歸」，原來春天，真的是順着柳枝，一步步走回來的。

我沿着河畔慢行，天地間還籠着一層薄薄的晨霧，遠處的景物朦朧朦朧，像一幅沒乾透的水墨畫。空氣清新得讓人忍不住深吸幾口，泥土的氣息混着草木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河水比冬日溫順許多，水面平靜，波光細碎，偶爾有微風拂過，才泛起一圈圈輕柔的漣漪。

最先感知春風的，永遠是岸邊的柳樹。冬日裏，它們枝幹枯硬，線條冷硬，一副沉默不語的模樣。如今再看，枝條早已悄悄變軟，不再是緊繃繃地伸展，而是自然地垂落，順着風的方向輕輕擺動。枝梢上，一點點嫩黃的新芽冒了出來，星星點點，不細看幾乎難以察覺，卻明明白白地宣告着，生機已經重返枝頭。

柳枝細長柔軟，挨着河面輕輕拂過，像是在與春水低語。沒有喧嘩，沒有盛放，只是安安靜靜地立在水邊，把冬日的沉寂一點點褪去，換上春日的含蓄。風大一些時，萬千柳絲一同輕揚，姿態舒展，卻不張揚；風停之後，枝條又緩緩垂落，安靜得如同不曾動過。一風一柳，一水一

春風柳上歸

影，自成意境。晨霧未散，柳影映在水中，虛實相映，朦朧又雅緻。偶有細雨零星飄落，打濕柳梢，嫩芽上掛着細碎的水珠，晶瑩剔透，更添幾分嬌柔，風一吹，水珠滾落河面，漾開細小的波紋，與柳絲的擺動相映成趣。

路邊的草色也漸漸顯了。枯黃的草葉間，新綠悄悄鑽出來，先是一小簇一小簇，後來便連成一片，淺淺的、嫩嫩的，帶着初生的怯意，也帶着不容阻擋的生機。牆角處，幾株早花悄然而開，花瓣不



近日，杭州西湖沿湖一帶柳樹抽出新芽，細長柳枝輕垂如絲。

大，顏色也不豔麗，卻開得自在安然，為這微涼的春日清晨，添上幾筆溫柔的色彩。

河畔的人漸漸多了起來。有人緩步慢行，有人駐足看柳，有人只是站在河邊，望着流水出神。大家說話的聲音都放得很輕，彷彿怕驚擾了這春日清晨的寧靜。老人們沿着河岸慢慢走動，神情閒適；偶爾有孩童跑過，笑聲清脆，落在風裏，很快又散開。人間的氣息，就這樣與春日的草木相融，平淡，卻又格外踏實。

我在柳下站了許久。看着枝條在風裏輕輕搖晃，看着新芽一點點舒展，看着霧氣慢慢散去，陽光從雲層裏漏下來，落在河面，落在柳枝上，落在濕潤的泥土上。沒有驚天動地的景象，沒有濃墨重彩的盛景，一切都是淡淡的、悄悄的，如同春風過境，只在細微處留下痕跡。

古人說「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說得實在貼切。冬天的離去，從來不是驟然收場，而是在梅花漸落、寒氣漸散中悄然走遠；春天的到來，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跟着風，沿着柳，一點點浸潤大地。它不在喧囂裏，而在柳枝的嫩芽間，風的溫度裏，河水的柔光中。

霧散了，陽光更亮了些。柳枝上的新綠，在光線下顯得愈發清晰。春風依舊在柳梢頭徘徊，一來一回，輕輕淺淺。我轉身往回走，腳下的泥土鬆軟，身邊草木含露，春風拂面，柳色入眼。不必感嘆，不必期許，春天就這樣實實在在地來了，落在枝頭，漫過河堤，藏在每一縷風裏。

五邑學子與唐人街往事



燈下集

海龍

近日整理華僑史及哥倫比亞大學校史，發現一些感人的往事：以廣東江門轄下的台山、開平等為代表「五邑」被譽為「中國第一僑鄉」。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這裏不僅向美國輸送大量勞工，更走出了一批深刻影響中國近現代化的留美學生學者。作為當年最早「開眼看世界」的群體，可以說，當時的五邑留學生群體是中國走向全球化的「排頭兵」。這批百年前的留學生最早的選擇當然是紐約，單是來哥大的閩人後代就不少，比如說康有為梁啟超都把他們的女兒送到了哥大來讀書。

不只精英階層，也有不少普通人孩子來哥大讀書。很多人不但是事業有成，而且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令世人矚目的貢獻。特別是那些學法律和商業的學子利用自己所學知識幫助華埠唐人街鄉親打官司、做諮詢，反對種族歧視、追求民族正義，他們的貢獻甚至影響到了今天，值得一記。

清末中國民氣未開，為什麼五邑人能考入哥大？即使百年後的今天，國人考哥大也是殊非易事，但五邑人確有絕招。首先，當

年他們有香港廣州教會學校的對接優勢。許多五邑學子先在香港或廣州的嶺南大學（原格致書院）學習，這些學校的教學體系與哥大直接掛鉤。其次他們有海外親屬網絡，五邑移民在紐約建立了強大的同鄉會組織，為來哥大留學的族人提供了有益的申請信息、落腳點和經濟支持。

准此，一百年前，哥大不僅是世界級學術殿堂，也是五邑留學生在紐約開展社會運動、維繫鄉情的核心陣地。由於五邑籍移民在紐約唐人街佔據了絕對人口優勢，哥大五邑學生也在當時扮演了「精英學者」與「草根僑界」間重要的橋樑角色。

首先，與江浙等地留學生不同，五邑留學生在紐約有一種天然的「主場感」。當時紐約華埠幾乎是五邑方言的天下。哥大學子平日在學校陽春白雪，周末就回華埠用家鄉話與開洗衣店、餐館的鄉親交流。除了談家常，他們也為鄉親開展掃盲教育、法律諮詢或翻譯工作。他們不僅是學生，更是僑社的「智囊團」。

除了思鄉情懷，學子們不忘愛國和政治參與。「五四運動」時期，以哥大學生為

首的留學生在紐約舉行了大規模遊行，聲討《凡爾賽和約》。抗日戰爭時期，哥大同學會與五邑僑團密切合作，在全美開展「一碗飯運動」並參加義賣，為國內抗戰籌款。

在為華人抗爭方面，哥大學子們更是當仁不讓。唐人街鄉親面臨美國移民局歧視政策時，經常尋求哥大留學生法律和政治援助。五邑學子則發揮法律專長，他們起草法律文書，在英文媒體上發表社論，抗議對華商的歧視。他們既能出入哥大的高級沙龍，又能蹲在華埠簡陋地下室裏為不識字的鄉親讀信、寫募捐告示。這種「學術精英」與「底層勞工」的深度綁定，讓五邑籍學生在紐約的政治影響力遠超其他省份。

他們的「名校光環」成了大眾輿論通行證。學子們給《紐約時報》寫信：每當美國媒體出現歧視華人言論，哥大五邑學生會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員」或「博士生」的身份給《紐約時報》或《紐約論壇報》撰寫「致編輯的信」，華埠底層勞工則「眾籌」付廣告費。這些五邑留學生的媒體戰，為《排華法案》的最終廢除埋下了伏筆。他們

證明了：筆尖和口才，在反抗種族歧視時與金錢和勢力同樣重要。

同時，五邑鄉親們唐人街商號的「教育貸款」扮演了「地下銀行」的角色。他們為五邑學子提供無息或低息貸款，唯一的條件往往是：學成之後，要為商號或僑社處理英文法律文書。五邑學子深知學費來之不易，因此他們在求學期間及畢業後，都會深度參與華埠的社會服務。

在這個基礎上，五邑精英們發展出了一套極其高明的「跨種族聯盟」策略，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與美國猶太裔律師及人權活動家的深度合作。在美國，猶太裔律師以嚴謹、敢於挑戰憲法權威著稱，這正是華埠在面對移民局非法搜查和無理拘留時最需要的素質。在這種跨種族合作中，五邑留學生扮演了「法律翻譯者」和「文化中介」的關鍵角色。這種「華人智囊+猶太法律先鋒」的模式，對後來的美國民權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它為一九四三年廢除《排華法案》鋪平了道路：正是這些跨族裔的法律合作，在國會聽證會上形成了多族裔聯合的聲音，終結了這個惡劣法案。